

【史料与考证】

对《懒寻旧梦录》中一件“往事”的辨析

刘方政

【摘要】夏衍《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回忆,是关于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到的那次著名的与“四条汉子”会面情形的,至今已经为一般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广泛采信。但是,通过与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及相关史料的比较、辨析,认为夏衍的回忆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疑点,本文对其分析判断是:阳翰笙、周扬、田汉和夏衍约鲁迅谈话的主要目的不是汇报工作,而就是鲁迅所说的“特来通知”他胡风是“内奸”;田汉参加见面并非不请自到;欢迎藤森成吉的宴会及鲁迅、田汉在宴会上的表现,在搜寻其他佐证并不困难但却搜寻不到的情况下,只能作为孤证而存疑。

【关键词】《懒寻旧梦录》;鲁迅;夏衍;“四条汉子”;胡风问题

【作者简介】刘方政(1962-),男,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山东 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济南),2020.3.73~79

作为“自传体回忆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的时间跨度整整五十个年头(从1900年到1949年),家道中落的辛酸、辛亥至五四的时代风云、留日时期的求学经历和参加革命后的兢兢业业,均历历在目。其中的“左翼十年”,不但篇幅占了将近二分之一,而且“难度最大”——对其中涉及的人和事“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①,颇费踌躇。然而,在夏衍看来,“这件事不写完,是无法交代的,因为对‘左翼十年’参加过的人都不写,势必只能让人胡写也。”^②本着对历史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夏衍打消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不快”^③的顾虑,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左联的成立、“两个口号”的论争等左翼文学的关键问题,以及十年中涉及到文学(文艺)的方方面面,都条理清晰、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左翼文学研究、尤其是左联组织结构和人事关系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不过,毕竟是对五十多年前往事的回忆和书写,漏记和误记便在所难免;毕竟写作此书时夏衍已经

八十多岁了,记忆的准确性打上一折扣也在情理之中。“左翼十年(下)”中有关鲁迅与“四条汉子”的关系,尤其是对1934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鲁迅与阳翰笙、周扬、田汉、夏衍见面的回忆,在左联研究、左翼文学研究、鲁迅与“四条汉子”关系研究、田汉研究、夏衍研究等学术领域,影响极为广泛,在谈到相关问题时,绝大多数论著都是直接引用《懒寻旧梦录》的叙述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和立论依据,如董健的《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陈坚的《夏衍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为数众多的文章均如此^④。然而,笔者在研读过程中,经过与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及相关史料进行对比发现,《懒寻旧梦录》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疑点:一、与鲁迅见面的主要目的是报告工作还是谈胡风问题?二、田汉是否不请自到?三、《懒寻旧梦录》提及欢迎日本人宴会上鲁迅与田汉的言行,作为“鲁迅对田汉有意见”的证据,在找不到其他佐证的情况下,能否不经过考辨而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

—

关于这次左联党的领导层集体与鲁迅见面,《懒寻旧梦录》是这样说的:

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大破坏(1934年10月——笔者)之后不久,有一天周扬到爱文义路普益里来找我,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我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了鲁迅,我把周扬的意思转达了之后,他就表示可以,于是约定了下一个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在内山书店碰头,因为星期一客人比较少。到了约定的时间,在我住家附近的旧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可是,意外的是除了周、阳之外,还加了一个田汉。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川菜馆设宴欢迎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和我都在座,开始大家谈笑甚欢,后来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论起来,讲到他和谷崎润一郎的交游之类。鲁迅低声对我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他就告辞先退了席。田汉欢喜热闹,有时在宴会上唱几句京戏,而鲁迅对此是很不习惯的),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会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去呢?我们四人上了车,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医院附近就下了车,徒步走到内山书店。见了鲁迅之后,看到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于是我说,这儿人多,到对面咖啡馆去坐坐吧。鲁迅不同意,说:“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这时内山完造就说:“就到后面会客厅去坐吧,今天还有一点日本带来的点心。”于是内山完造就带我们到了一间日本式的会客厅,还送来了茶点。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

间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是就在周扬谈到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这一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了。幸亏阳翰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才缓和下来,又谈了一些别的事。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说着就很愉快地笑了。^⑤

根据上面的话,五人的行为线索是:鲁迅,在内山书店等待四人;拒绝夏衍因书店人多而更换谈话地点的建议;静静地听阳、周的报告;由于田汉提出胡风问题而“不高兴”;为左联筹款一百元,开了个玩笑并“很愉快地笑了”。

阳翰笙,通过周扬让夏衍约鲁迅见面;向鲁迅汇报“文总”的工作情况;将尴尬气氛化解开来。

周扬,按照阳翰笙的意见,让夏衍约鲁迅见面;向鲁迅“报告”年轻作家的情况。

夏衍,遵照阳翰笙和周扬的意见,约鲁迅见面;叫好出租车,带其余三人到内山书店。

田汉,不请自到参与左联党的领导层向鲁迅报告工作;在周扬向鲁迅汇报工作时“忽然”提出胡风问题,致使场面一度很尴尬。

这样,问题(或者说作者的意图)就很清楚了:夏

衍只是见面的中间联系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实质性的言行;阳翰笙和周扬作为文委和左联的领导,先后报告各自分管的工作,鲁迅很满意。所以,导致鲁迅与“四条汉子”失和的责任只能由田汉和鲁迅来承担。

田汉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一,他不应该参加见面活动,原本的计划只有阳、周、夏去看望鲁迅,田汉是不请自到,如果他不来,就不会惹鲁迅不高兴,也就不会有“四条汉子”的说法;其二,田汉不适于参加见面活动,因为鲁迅早就对他有意见,他本人又说话不分场合、不知轻重,也就是说,如果换作一个鲁迅没有成见而言谈又有分寸的人,即便不请自到地参加了见面活动,也不可能惹鲁迅不高兴;其三,田汉在见面过程中言语不当,周扬汇报过程中,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他贸然提出胡风“政治上有问题”“靠不住”,而胡风恰恰与周扬和夏衍矛盾很深,又恰恰是鲁迅非常喜欢的左翼理论家。

鲁迅应该承担次要责任。较为固执——因为书店中有几个日本人,夏衍出于安全考虑,要求换个地方谈话,被鲁迅以“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为由拒绝了;过于偏袒胡风——听不得一句对胡风不利的话,只是因为田汉的善意提醒,不惜与左联党的领导层闹得不愉快。

在《懒寻旧梦录》之前,夏衍对“我们和鲁迅谈话的情况”的回忆有两处,一是1957年8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以下简称“发言”),一是1980年在《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以下简称“往事”),《懒寻旧梦录》的叙述与“往事”除个别地方外,基本相同。而“发言”是这样说的:

有一次,周扬、田汉、阳翰笙和我四个人,——这就是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从汽车中跳出来的四条汉子”,——为了“左联”的工作去找鲁迅先生。在内山

书店老板的客厅中见了面,起先谈得很融洽,鲁迅先生还给“左联”筹了款,后来谈到胡风问题,田汉同志因为胡风在国民党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对他表示有一点怀疑,鲁迅先生听了很不高兴,接着我把话岔开了。^⑥

将“发言”与“往事”《懒寻旧梦录》的回忆结合起来看,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其一,“发言”称,四个人一起去找鲁迅谈左联的工作,《懒寻旧梦录》则说,原计划向鲁迅“报告工作”的只有周扬、阳翰笙和夏衍三人,田汉是在夏衍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周扬、阳翰笙同去的。

其二,为了证明“鲁迅对田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有看法”,《懒寻旧梦录》举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例子:田汉酒酣耳热之际,说话不着边际且与宴会的主题距离较远,怠慢了日本客人;宴会的东道主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朋友,客人是来自日本的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和夏衍是陪客,只是因为田汉“高谈阔论”“与谷崎润一郎的友谊”、只是估计田汉“又要唱戏了”,鲁迅竟然“告辞先退了席”,这是对主人和客人的极不尊重。但“发言”和“往事”中却并没有与此相关的文字。

其三,“发言”中,是“谈到胡风问题”在前,田汉提出对胡风的“怀疑”在后;“往事”则说,在周扬跟鲁迅谈到工人文艺运动时,田汉突然提到胡风问题;《懒寻旧梦录》说,“周扬谈到青年作家的时候”,田汉提出了胡风问题,并且都是肯定的语气——胡风政治上有问题、靠不住。

其四,谁将尴尬的气氛转移了?“发言”中是“我把话岔开了”,“往事”和《懒寻旧梦录》中则是“阳翰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

其五,鲁迅为左联捐款是在谈到胡风问题之前(“发言”)还是之后(“往事”《懒寻旧梦录》)?

其中,导致鲁迅由“微笑”到“不高兴”的关键是

田汉莽撞地提出的“胡风问题”，这是问题的重中之重。按照《懒寻旧梦录》的回忆和行文内含的逻辑，与鲁迅见面的初衷是“报告工作”和“听取意见”，“胡风问题”不在计划之内，如果田汉没有提出胡风问题，鲁迅就不会“不高兴”，时隔两年之后也不会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提出“四条汉子”的说法，1960年代中期也就不会有这个含有严重政治色彩的称谓。再进一步，都是因为田汉的莽撞，才连累夏衍和周扬^⑦三十二年后遭受囹圄之灾。

二

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看看其他当事人是怎么说的吧。从阳翰笙的两种回忆录中，都找不到关于这次与鲁迅见面的回忆^⑧。除夏衍外，另外三人的说法按时间先后如下。

1936年8月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说：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⑨

周扬在1936年12月左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我们根据一些可疑的情况，曾怀疑他（胡风）和国民党有关系。一九三四年，阳翰笙、夏衍、田汉和我（也就是所谓“四条汉子”）去看望鲁迅先生，就是专门为了把我们对胡风的怀疑告诉鲁迅，提请他的注意。当时我们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鲁迅就不相信我们的话，而且对我们产生了不信任和反感。^⑩田汉1967年是这样“自述”的：

为了胡风问题，周扬、夏衍、阳翰笙和我去看过一次鲁迅，我不太晓得情形，主要是周扬谈的，夏衍虽以调人自任，但还是不欢而散。^⑪

三人回忆的时间虽然前后有别，语言表述虽然简繁不一，但对事情的原委经过和结果的描述却基本一致：第一，四个人与鲁迅见面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夏衍所说的向鲁迅报告工作、听取意见，而是谈胡风问题——“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鲁迅）、“专门为了把我们对胡风的怀疑告诉鲁迅”（周扬）、“为了胡风问题……去看过一次鲁迅”（田汉）；第二，谈话的结果是“不欢而散”，而并不是“谈得很融洽”。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时，当事人全部健在，阳、周、田、夏四人没有指出事实上的出入，应该是可信的。周扬的话出自“1936年12月左右”“写给中央的报告底稿”^⑫，其严肃的政治性、组织性和纪律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党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必须保持对党中央的高度忠诚，也非常清楚欺骗中央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在“见面”后两年的叙述也应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虽然《田汉全集》用的是“难中自述”作为标题，实际上这是田汉1967年6月9日的“交代材料”，由于处在“隔离审查”状态，其他的几个当事人还健在，他不能、也不敢在与鲁迅密切相关的历史问题上随意编造，那时的他，力求自保已属不易，绝对不会说假话。因而，田汉“自述”的真实性也应该是可靠的。

对于四人“看望”鲁迅的目的，既然鲁迅、周扬和田汉的说法明确而一致——谈胡风问题，那么，夏衍的回忆便有大可推敲之处，他究竟为什么要对见面的“目的”进行置换呢？“左联”时期，夏衍与鲁迅、胡风的关系很是紧张，1955年，胡风被打入“另册”，此时，自觉主动地与胡风划清界限、甚至反戈一击，既

能表现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又能显示自己超前的洞察能力,所以,1957年的“发言”中说五人见面时“谈到了胡风问题”及田汉的怀疑;写作“往事”和《懒寻旧梦录》时,组织即将或已经在政治上为胡风平反,此时如果再坚持向鲁迅提出胡风的“内奸”问题,便显得政治上不甚高明,甚至有挑拨离间、告黑状的嫌疑。然而,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一个怎么都抹杀不掉的存在,夏衍既不能也没胆量冒着质疑鲁迅、篡改鲁迅的风险,只能顺着鲁迅的叙述思路而改变自己的叙述策略:他本人在谈话过程中一言未发,阳翰笙和周扬也只是汇报“文委”和左联的工作情况,主动谈到胡风问题而引起鲁迅反感的只是田汉的个人行为,因而,他们三人是冤枉的,是代田汉受过。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历史事实问题,究竟是谁提出了胡风的“内奸”嫌疑呢?鲁迅的信和周扬的报告都没有指出具体是哪个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会是同去的四个人(“四条汉子”)不分主次地你一言我一语,而是或者由一个人向鲁迅报告,或者由一个人主谈,他人补充、帮衬。因而,田汉“自述”中所说自己“不太晓得情形”“主要是周扬谈”胡风问题、夏衍在鲁迅和周扬之间做调和的工作,既合情理,又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1934年,周扬在左翼文化界的实际地位和话语权的分量明显高于作为“文委”书记的阳翰笙,更不要说田汉和夏衍了,此其一。其二,较之于阳翰笙和田汉,周扬、夏衍与胡风的关系更为紧张。其三,左联的活动经费只有“鲁迅和茅盾每月所捐的三十元钱”^⑩,领导人和盟员都没有任何报酬,但每个人却都存在养家糊口的实际生活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周扬在经济方面无后顾之忧:“从1930年一直到1935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周扬发妻,宦宦人家之女——笔者)都要回湖南益阳县老家去探亲,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圆和珠宝,估计价值为

1000圆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80圆。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1927年)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⑪田汉、夏衍和阳翰笙则没有这么幸运,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都要靠自己的劳作来换取,1933年7月田汉“担任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200银圆左右”,夏衍除了译书外,还在明星影业公司和艺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剧顾问,“每月至少收入200圆”,阳翰笙在艺华主持编剧委员会,“月薪估计为100-200圆”^⑫。虽然他们“打进去”是为了利用资本家的资金和设备通过拍摄电影宣传革命,但解决生计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胡风就职于中山文化教育馆,也应作如是观。首先,这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田汉、夏衍、阳翰笙供职的“艺华”“明星”无本质区别;其次,胡风到中山文化教育馆谋事,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找个吃饭的职业”,事先还特意向左联书记处做了汇报,“茅盾、周扬他们都主张我去”^⑬。

因为阳翰笙、田汉、夏衍的情况与胡风相差无几——一边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一边在既非官方又不“左翼”的机构、公司挣钱养家,所以,胡风的问题,周扬出面与鲁迅谈,最为合适。结合周扬上文的语气,夏衍“发言”中所说的“谈到胡风问题”时田汉提出了“一点怀疑”,也可作为“主要是周扬谈”的附证。

在写作《懒寻旧梦录》时,夏衍没有看到周扬给中央的报告和田汉“自述”的可能,所以,他只能依据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事件经过虽然比鲁迅的叙述更加详细,暂且不说在最关键的问题上的南辕北辙:与鲁迅见面的起因是报告左联的工作情况并希望得到鲁迅的指示,胡风问题并不在提前准备的范围之内,这与同为当事人的上述三人的叙述和回忆便有了距离;也不必在意“发言”

和“旧梦录”在鲁迅捐款的时间节点、是他还是阳翰笙化解了尴尬气氛的前后矛盾之处。仅仅为了将自己和周扬择洗得一干二净,将左翼领导层失和的责任推到已经作古的鲁迅和田汉身上,最起码是死无对证的。

三

按照《懒寻旧梦录》的行文次序,田汉主客观上存在引发冲突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不请自到;鲁迅以前就对他有意见;无端插话提出胡风是内奸问题。

胡风问题已如前述,这里先说不请自到。上海中央局在经过国民党1934年6月和10月的两次“大破坏”之后,按说应该更加强调工作中的纪律性和保密性,既然文委书记阳翰笙提议文委委员周扬和夏衍向鲁迅报告工作,那么是谁告诉了同为文委委员的田汉?如果是不请自到,为什么田汉来了,却不婉言谢绝或明确劝阻呢?往轻处说,这是对鲁迅的不尊重——比约定的临时增加了一个人;往重处说,则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接下来,既然只是阳、周、夏三人和鲁迅见面,田汉为什么与阳、周一同来到了约定地点呢?只有两个可能:一种可能是阳或周泄露了消息、告诉了田汉;还有一种就是本来参加见面的就有田汉,夏衍由于种种原因误记了(当然,理论上说,也有田与阳、周不期而遇而加入的可能,暂且不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如此,阳、周也不应该带他参加见面)。第一种情况前面已说,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阳翰笙和周扬作为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不会没有起码的纪律意识。就当时在文委和左联党的领导层的职务来说,阳翰笙是文委书记,夏衍、周扬和田汉均为文委委员^①;周扬为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均为左联执委,周扬、田汉为左联常委,田汉并且是左联代理行政书记^②,如

果按照职务排序,应该是:阳翰笙、周扬、田汉、夏衍,文委和左联党的领导层主要由他们组成,共同向鲁迅报告工作并听取意见顺理成章^③。如果田汉没有接到通知,怎么会与阳翰笙、周扬同时来到会合地点?不要说田汉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就是他还健在的1957年,夏衍在“发言”中也没有公开这一细节,只是在田汉去世十几年之后才这样说,可信度的高低是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的。更何况,在周扬和阳翰笙有关左联工作的回忆文章中,也没有田汉不请自到的片言只语。

《懒寻旧梦录》中,参加见面的人中没有田汉理由似乎很充分:鲁迅很长时间以来就对他有意见。关于鲁迅与田汉的关系、关于鲁迅对田汉某些方面的不满,学术界的研讨已经很细致了,这里只将与本文有关的问题做一点重复性的叙述。鲁迅对田汉的不满,始于1921年,8月29日在《致周作人》信中说:“张黄今天来……又云郭沫若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④1928年,田汉创办的南国社招股办书店,并附设精美咖啡店,鲁迅8月15日致章廷谦信中,讽刺道:“田汉也开咖啡店,广告云,有‘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一伙女侍,在店里和饮客大谈文学,思想起来,好不肉麻煞人也。”^⑤即使如此,他不但与田汉共同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1930年2月13日、1930年3月2日),而且在南国社被查封的前夕(1930年9月),“鲁迅先生得着南京的消息赶忙告诉我,要我小心……我因鲁迅先生的警告侥幸获免。”^⑥田汉在避难时,曾请鲁迅代转给郑振铎的信及译稿,鲁迅收到信的当夜(1930年10月4日)即委托蒋径三将此事办妥^⑦。在不关乎革命文学事业的个人恩怨上,鲁迅绝对是从大处着眼的,对作为晚辈的田汉在为人行事方面的粗疏、任性,并不是很计较。即使是

令鲁迅对田汉“憎恶和鄙视”的《调和——读〈社会月刊〉8月号》(8月31号出版)一文,据学者考证,也是在这次见面之后鲁迅才知道“绍伯”是田汉的化名^③。再说,将个人间的是非恩怨掺杂到革命文学事业中,也太轻看了鲁迅的胸怀与境界。

《懒寻旧梦录》所举证“鲁迅对田汉有意见”的具体例子,是在欢迎日本左翼文艺界领袖藤森成吉宴会上田汉的“高谈阔论”引起了鲁迅的反感。藤森成吉(1892年-1977年),著名作家,1928年当选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第一任委员长,1930年1月经由上海旅欧,1932年5月回国,不久即被捕,“被宣判徒刑一年”。1933年11月发表“转向”声明,宣布脱离“联盟”,放弃革命文学^④。夏衍曾翻译过他的剧本《牺牲》和《光明与黑暗》(《牺牲》,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7月版),1933年现代书局曾出版过森保(任钧)翻译的《藤森成吉集》。由于《懒寻旧梦录》没有提供欢迎宴会的大致时间,因而,要弄清欢迎藤森成吉宴会上“鲁迅对田汉有意见”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就要考察藤森成吉何时到过上海。1930年1月6日,藤森成吉前往欧洲途经上海转船暂停,夏衍“等了三个钟头,他还不到预约的地方”,藤森成吉则“因为找不着我们约定的地方,后来终于和林守仁君们去天蟾舞台看戏去了”,夏衍第二天到船上为他送行才见了一面^⑤。另外,藤森成吉“转向”前还有一次可能到上海的机会: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委员会预定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召开反战大会,8月25日,日本“纳普”开会准备选出参加上海会议的代表,但遭到警察和右翼组织的阻挠^⑥,最终,“日本代表被日政府禁止参加大会”^⑦。也就是说,藤森成吉到上海且与内山完造、鲁迅、茅盾、夏衍、田汉等人聚宴的唯一可能就是1933年10月(上海反战大会之后)到1934年10月(鲁迅与四人见面之前)的一年间。

田汉和夏衍这段时间的日记均不存,鲁迅和茅盾的日记中没有这次聚会的记载,并且《鲁迅全集》中从未出现过“藤森成吉”的名字;1930年1月6日,藤森成吉在上海停留一天,稍后,夏衍写了短文《藤森成吉》,藤森成吉则有《寄自旅中》^⑧一文,二者对会面的情况都做了简短的描述,但《懒寻旧梦录》中所说的“欢迎宴会”以及藤森成吉到上海的活动,二人却均未留下任何文字;滕森岳夫的《作家藤森成吉传》中也没有传主这段时间到过上海的记载。因此,目前为止,夏衍的这段回忆只是一个孤证,有待发现其他资料予以证实之后,才能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因为在搜寻其他佐证并不困难但却搜寻不到的情况下,孤证只能存疑,不能作为立论的依据。

某种意义上,对于研究者来说,回忆录,尤其是当事人的回忆录,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但是,也正如沈志华所说:“回忆和口述史料也有一个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时代久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有些人写回忆录,有条件核对档案记载,又具平常心态,这比较让人放心。但也有很多人是单凭自己的记忆或好恶,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时特别谨慎,办法就是尽量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比较和鉴别。”^⑨正因为要做到“功过并录,不能蔓饰”是相当大的难题,所以,搞清楚历史的真相和人际之间的是是非非,依据回忆录研究历史便必须有所考证、辨析。

注释:

①③夏衍:《懒寻旧梦录·自序》,《夏衍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第5页。

②夏衍:《致陈白尘》,《夏衍全集》(第16卷),第84页。

④刘平:《田汉与鲁迅》,《琼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衣伟雄：《鲁迅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真相》，《文史春秋》，2001年第5期；刘小清：《鲁迅眼中的“四条汉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11期；廖久明：《鲁迅与田汉》，《书屋》，2006年第7期；陈漱渝：《两个口号·三份宣言·四条汉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等等。

⑤夏衍：《懒寻旧梦录》，《夏衍全集》（第15卷），第140-141页。

⑥转引自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⑦在周扬看来，1960年代中期后的十年中，虽然同为鲁迅所斥责的“四条汉子”，他和夏衍与田汉、阳翰笙是有区别的：“一九三五年，阳翰笙、田汉被捕后，自首叛变，所谓‘四条汉子’就起了分化。我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我在他们被捕后困难的条件下，坚守了工作岗位，保存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当时的许多党员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阳翰笙、田汉被捕后自首变节了，说他们是叛徒自然是可以的；但在他们被捕叛变后，我就和他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道路了。抗战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了阳翰笙、田汉的党籍。全国解放后，我主持文化部的工作，夏衍以及田汉、阳翰笙等都在文化部门担任比较负责的职务。”（徐庆全整理：《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草稿整理者徐庆全认为，“上书”写于1976年底或1977年初。

⑧阳翰笙的回忆录《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共分三部分，第二部分“左翼十年”共收录四篇文章，均没有提到他们四人与鲁迅见面的事；《阳翰笙选集》第五卷“革命回忆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同样没有这方面的文字。

⑨《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4-535页。

⑩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⑪田汉：《难中自述·自传》，《田汉全集》第20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页。

⑫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⑬胡风：《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胡风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⑭⑮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第172、175、176页。

⑯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第301页。

⑰⑱张广海：《政治与文学的变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史考论》，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21页，第145页。

⑲周扬在给中共中央的“上书”中说：“一九三四年，阳翰笙、夏衍、田汉和我四人去见鲁迅，是代表‘文委’去的，当时我们都是党在文化方面的负责干部。”（徐庆全：《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

⑳㉑《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5页，第633页。

㉒田汉：《漫忆鲁迅先生》，《田汉全集》（第1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520页。

㉓《鲁迅全集》（第14卷），第840-841页。

㉔“综合鲁迅书信可以看出，鲁迅知道绍伯即田汉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的：11月1日给窦隐夫的信、11月5日给萧军的信、11月8日给郑振铎的信都提到了对‘同人’、‘上海文人’的不满，由此可推断，直到11月底，鲁迅才知道绍伯即田汉。也就是说，与‘四条汉子’见面时，鲁迅很可能还不知道绍伯即田汉。”（廖久明：《鲁迅与田汉》，《书屋》2006年第7期）

㉕《藤森成吉集》，森保译，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10月版，第242-243页；藤森岳夫：《作家藤森成吉传》，东京：中央公论事业出版，1986年版，第108页。

㉖夏衍：《藤森成吉》，《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1930年5月1日）。

㉗《日本反战者会议被扰乱》，《时事新闻》1933年8月27日。

㉘倪墨炎：《上海反战大会的始末》，《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第705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㉙《拓荒者》1卷3期（1930年）。

㉚沈志华：《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北京日报》2013年3月11日。